

## 粒子诗抄(续五)

李华钟<sup>1</sup> 冼鼎昌<sup>2</sup> 编

(1 广州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2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39)

葛墨林

### 杭州会议诗抄(1982年10月)

杭州会议  
殷鹏程

中秋国庆喜相逢,浓妆西子添秀容。  
学府聚会谈粒子,高楼谈笑议新功。  
老将益壮多贡献,新秀奋发攀高峰。  
平湖泛舟探明月,难见嫦娥羞掩容。

1982年10月

访乐山大佛  
胡宁

大佛扶膝望浮尘,无言枯坐古犹今。  
苦思千载似难悟,细看群峰苦未真。  
元气磅礴化小粒,心旗飘动记前因。  
绵城胜事长相忆,更过巫山下彩云。

1982年9月

注:此诗是胡公在杭州粒子理论会议的总结会上作报告时所出示。

杭州游湖  
李华钟

十载重临夜泛舟,岸灯远渐近堤幽。  
三潭月暗空寻印,九曲桥乱小瀛洲。  
人满画亭烟火里,玉宇琼阁墨云秋。  
凭栏冷眼波光掠,旧梦西湖去不留。

1982年

诗三首

(一)夜吟

轻风细雨夜难眠,孤灯苦读玉泉边。  
湖光什色皆无味,幻谒如来与斯坦。

(二)无题

春日煦煦西湖畔,烟柳垂杨断桥边。  
白衣娇客何处去?空留小墓叹桑田。

注:葛墨林是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当时在兰州大学任教。

[小墓 苏小小墓。]

(三)过西安

秦都月夜伴残冬,徘徊站台喧闹中。  
此去江南少故旧,躲进小楼伴书丛。

背景说明:

20世纪80年代初的从化会议为国内外从事粒子理论研究的华裔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深入讨论的场合,也促进了科学家们对彼此的工作的相互了解,初步建立起个人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打开了一定的国际交流渠道,于是在会议之后不久,出现了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出国访问交流的第一次高潮,许多人作为访问学者到国外的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作较长时间的合作访问。在这之前,中国学者的国际交流大抵限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会前会后的顺访,或是走马看花式的按双边协议进行的访问,总的来说这些方式的访问收效有限,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学者几十年来出国机会甚少,语言能力平均较差,不利交流讨论;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对国外研究教学机构的日常工作方式未能适应,还来不及融入对方研究集体就要启程回国。这次兴起的出国访问交流高潮对我国理论粒子物理学家走出国门了解国外研究发展方

向、进入国外研究的大潮流十分有助。这个高潮在国内的一个附带结果是有两年时间开不成大型的全国性粒子物理综合学术会议，直到1982年9月的杭州粒子理论会议才宣告此高潮大致告一段落。那时做粒子理论研究的李文铸教授任浙江大学副校长，汪容教授离开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转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他们负责组织了杭州会议，会议开得十分成功。会上除了国内研究人员的工作报告外，还有出国访问归来的物理学家报道他们在国外访问期间所做的研究工作结果以及对国外研究进展的综合介绍。会议结束时由胡宁教授作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之先出示了一张透明片，上有他最近的一首诗作，收录在这里。

## 杜布纳诗选(1960—1964)

### 三八节舞会有感

冼鼎昌

美髻欧装竞艳衣，狂摇急摆舞如痴。  
弦歌多少兴亡感，泉下丹娘知不知？

1960年

注 [丹娘] 苏联卫国战争女英雄，敌占区地下游击女战士卓娅·安娜托利耶芙娜·科斯莫捷米扬斯卡娅的化名，就义时年仅十八岁。

### 秋意

冼鼎昌

红黄橙褐染秋林，午日迟迟树影深。  
萧瑟杨桦风下立，低垂金发作商吟。

1961年

注 [商吟] 欧阳修《秋声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

### 六一年新春门联续成

冼鼎昌

北国风霜紧，南乡气象新。  
且看青史上，后笑是何人？

1961年

注 [后笑] 西谚云：谁笑得最后，谁才笑得最好。

### 过伏城斯大林碑残台发叹

冼鼎昌

大伏尔加城之运河入口处，原有列宁、斯大林二巨雕像相对峙立。年前余过此，甚叹其宏伟肃穆，今岁余自欧返，见斯像已敝，唯残台尚在，不胜感喟而作。

玄云何事郁难开，寂水空林对断台。  
想是英魂久不散，奔霆震焰看重来。

1963年

### 伏城河岸看浮冰

冼鼎昌

伏城五月看浮冰，雪岸长河映日明。  
远入云天同一色，照来坡草更青青。

1963年

### 过西伯利亚

冼鼎昌

迤远遍茫茫，素原接大荒。  
云低天暗翳，雾重日昏黄。  
叶尽林萧索，冬深岭莽苍。  
岁穷冰雪厚，万物望春阳。

1964年

### 过拿乌什基

冼鼎昌

拿乌什基系苏联出境站，去年于此曾发生虐华事件。

雪原初日影生明，万里晴光照太清。  
莫谓玄云深锁久，春风有日过拿城。

1964年

背景说明：

1956年3月，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政府决定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以下简称联合所），提供各成员国科学家共同使用在原子核和粒子物理两个领域进行研究的设备，开展研究工作。研究所设在离莫斯科一百多公里的小镇杜布纳，运行经费由各

物理

成员国分担,中国负担总经费的五分之一。

从1956年起,中国陆续派出科技人员到联合所工作。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sup>①</sup>先生和胡宁先生首先带领他们的助手来到杜布纳。1959年,朱洪元先生领导的研究小组,1961年,张文裕<sup>②</sup>先生和他的助手,也都先后来到联合所。20世纪60年代之后,经常在联合所工作的中国人达二十余人,直至中苏关系破裂,全部中国科技人员于1965年撤回为止。

联合所的成立,为我国的核科学和粒子物理学提供了一个通向外界的窗口。当时联合所里有好些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实验设备有不少是相当先进的。例如,那里建成的质子同步加速器是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这样的环境对于培养我国青年一代物理学家是很有利的,这是就联合所对中国人才培养带来的好处而言。从另一个方面说来,中国科学家对联合所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工作成绩十分出色,不但在杜布纳有口皆碑,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广泛的承认。多年以后,一个美国知名物理学家在评论历年来在联合所那个曾经是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上的实验工作时甚至说,除去王淦昌领导的小组发现的 $\Sigma^-$ (读作反西格马负)超子之外,其余便无足道。虽然评论难免带着个人观点,甚至偏颇,但反映出中国科学家的重要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我是在1959年初和何祚庥一起到杜布纳的。那时胡宁刚回国,周光召<sup>③</sup>和唐孝威<sup>④</sup>已经脱颖而出,做出很出色的工作;王淦昌正在率领他的小组紧张地分析他们的实验,几个月后便向世界宣布他们的重大发现。在联合所的中国人都很勤奋,每天工作到深夜,每周都有自己举办的学术活动,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到了星期天也会去看场电影或是到树林里去(杜布纳城位于杜布纳河流入伏尔加河之处,小城周围为树林环绕),夏天散步,秋天采蘑菇,冬天滑雪。头几年中苏关系还好时,中国人和苏联人一起渡周末是常有的事。不过即使在那时,苏联国内发生的变化已经开始,对于我们这一代在“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口号以及《卓娅与舒拉的故事》<sup>⑤</sup>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刚刚传入苏联的呼拉圈和摇摆舞实在是很大的文化震击,这都反映在“三八节舞会有感”一诗中了。

从1960年开始,中苏两国的分歧逐渐公开化,开始是在《人民日报》和《真理报》上的论战,慢慢地我们这些在杜布纳居住的中国人的生活也受到影响。有一天我从外面回家,一个最多只有八、九岁的小男孩,嘴里喊着“中国人!中国人!”跟在我后面走

了一条街。我们和苏联同事之间友好融洽的关系一下子蒙上阴影,争论时常发生。在亲密的朋友之间的这种争论有时是很痛苦的。那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格罗莫夫博士,他是一位好的物理学家、正派的苏联共产党党员,曾经参加过卫国战争,无论是为学与为人,都是值得深交的朋友。我至今还记得在我们多次争论之后他最后说的一段很深沉的话:“你以为我们在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时心里是好受的?要知道当年我和战友们在战场上是高呼着‘为斯大林,乌拉!’去冲锋的。那是由衷的呐喊,至今我还为那种英雄气概自豪。但是这丝毫没有抹掉我对战前肃反的记忆,从小学到中学,每隔不久老师便要我们将教科书里一些党、政、军领导人物的肖像涂掉,或是把课文整页整页地撕掉。当你知道这些被涂掉的人物,如屠哈却夫斯基元帅<sup>⑥</sup>,和我国后来的灾难有如此深刻的关系时,你的心便会刺痛。我的朋友,记住我的话,你不要说比我们俄罗斯人更了解这个国家。”我们此后再也没有提到这个话题。26年之后我们在杜布纳再次见面时,大家相视一笑,经过这些年的经历,任何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那时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在加紧进行。杜布纳对岸是大伏尔加城,在那里莫斯科运河流入伏尔加河口处的斯大林巨像被拆除,斯大林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被移走,我们是这一系列事件的见证人。但是格罗莫夫博士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特别是当我经过斯大林巨像的残台时,想到那里当年曾经是莫斯科保卫战红军与德军浴血战斗之处,牺牲者英魂有知,不知对这一段历史事件作何感!

多年来在联合所的中国共产党支部的书记一直是由科学家兼任的。1961年从国内派姚毅同志来杜布纳担任专职的支部书记,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1963年苏联政府将姚毅驱逐回国。两国交恶,留学生、劳工往往首当其冲,就在那一年,报载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归国途中于苏联出境站拿乌什基受到刁难和虐待,此事在杜布纳的中国科学家中引起很大反响。1965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宣布退出联合所,撤回全部科学家。

这里选收的几首诗,大抵反映了当时在杜布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情。在重读它们时,大大悟到人们为什么往往“悔其少作”。不过,只要当时所写的是真正出自内心和诚实的,我以为大可不必悔。历史事件有如大风暴,在尘埃里景物难清,要等沙尘落定才好对这场风暴作确切的评说。这里收的,就让它们如同尘埃里看到的情景作为记录留下来吧。

注①王淦昌(1907—1998),中国科学院院士,实验物理学家,在核物理、粒子物理以及我国原子弹及氢弹的研制中均作出过重大贡献。曾任联合所副所长。

②张文裕(1910—1992),中国科学院院士,实验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③周光召,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在联合所写出的“关于处理角动量的螺旋度分析和强作用赝矢量流部分守恒”的论文,已经成为粒子物理理论的标准文献。

④唐孝威,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浙江大学教授。

⑤《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是一本由卓娅的母亲写的关于卓娅和她的弟弟舒拉的成长和参加卫国战争、英勇牺牲的故事的书。卓娅,见“三八舞会有感”注。

⑥米哈尔·尼古拉耶维奇·屠哈却夫斯基(1893—1937),苏联元帅,杰出的军事家,对建立及保卫新生的苏联建有殊勋,是当时苏联国防现代化的积极倡导者。1937年根据盖世太保提供的伪造文件,以德国间谍罪被枪决。

## · 前沿和动态 ·

### 正确使用 SCI 数据库

在科学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研究工作者往往被鼓励在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以下简称 IF) 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按照编纂 SCI 数据库的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 的计算方法,所谓期刊的 IF,它代表的是,一种期刊所发表的论文被全世界 5 700 种期刊引用的平均次数。例如,Nature 和 Science 的 IF 约为 25, Phys. Rev. Lett. 和 Phys. Rev. B 的 IF 约为 6.5 和 2.8。在一定意义上,IF 客观地反映了某种期刊在其所属学科的影响力。期刊出版者为了吸引高质量的论文,追求高的 IF;图书管理人员为了方便,也愿意订购 IF 值高的期刊;有的国家(如芬兰)甚至在法规中写入了“鼓励在高 IF 期刊发表论文”的条文。然而,由于 SCI 数据库的生成办法具有某些本征缺陷,或者数据在用于评价科研工作者业绩时被不正确地使用,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对 SCI 数据分析有效性的争议。

《物理》2001 年第 1 期曾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类基因组的综述文章,其中引用了发表于 Nature 的团体作者为“21 号染色体定位和测序合作组”(The chromosome 21 mapping and sequencing consortium) 的一篇文章。论文是由来自世界各国的 63 位科学家共同完成,他们的名字(以 M. Hattori 为首)被一一列在团体作者“...consortium”之后。按照 ISI 的计算程序,如果有人以 M. Hattori 为第一作者引用上述论文,则对该论文的引用数加 1;如果有人以“21 号染色体定位和测序合作组”为团体作者引用了上述论文,则对引用数没有贡献。结果,由于这类不可预见因素(“可引用文章”的丢失)的存在,在最终出版的 SCI 数据库

中,这篇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论文的被引用数表现为“缩水”。相反,由于 SCI 统计程序不能自动地剔除对“不可引用文章”(如 Nature 中的新闻或科幻小品)的引用数,有时(在最坏的情况下)可导致 IF 值虚增 40%。

最近,Nature 周刊“新闻特写”专栏作家 Adam 撰文讨论了 SCI 数据库的可靠性问题,以及数据分析被用于评价科学家工作时的有效性问题。ISI 编纂 SCI 已有 40 年的历史,其初衷是提供一种信息抽取的方式,以便研究工作者能够快速检索到相关的文献和作者。然而,对于一个政府机构或者科学基金会来说,为了把握资金的投向,评估官员们为了省事,往往简单地使用 SCI 数据,测度研究机构或个人的研究质量。一般认为,在高 IF 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相应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但研究结果表明,事实上并非如此。

ISI 的创始人 E. Garfield 博士在对 SCI 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诺贝尔获奖者的论文被引用率是平均引用率的 30 倍。但同时他也提醒人们注意,简单地利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工作,很容易导致“误判”。在 20 世纪 90 年代,Garfield 把 ISI 卖给了 Thomson 公司,之后 ISI 的经营方针有所改变(指向赢利)。去年 ISI 开始销售一种被称为 ESIC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的软件包,并声称用此软件可避免简单使用影响因子所带来的问题。按照广告上的说法,该软件是以“直接引用计数”来评估未来雇员、合作对象、论文评阅人和竞争对手的。目前,ISI 在科学引文数据方面仍占据垄断地位,并且,有些人正在侵

(下转第 608 页)